

## 自序：對博學、卓識、壯采的嚮往

閱讀錢鍾書、夏志清、余光中諸位先生的作品，始於我的大學時期。讀錢先生的《圍城》後，難免對自己的一些老師「另眼相看」。讀夏先生的〈愛情·社會·小說〉等文，乃知文學評論不能守在一隅，而應中西兼顧。讀余先生的《左手的繆思》和《逍遙遊》，驚訝於中文的光彩，以及古今六合神思的天地如此寬廣。修讀《文心雕龍》一科，發覺這部文論經典可助我把錢、夏、余三人的傑出加以闡釋。

讀其書，想見其人？1969我大學畢業那年，春天，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講堂聽了余光中先生的演講後，約二十個文藝青年集體在九龍拜訪這位名詩人名散文家，我是其一；我們沐在春風裏，沐在春陽的光中。畢業後從香港到美國讀研究院，寒假裏千里迢迢到了紐約；冬天，立雪廈門，進而登堂入室，拜訪了志清教授。拜晤錢鍾書先生，則是15年後的事。1976年我從俄亥俄州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，回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教書。1984年初到北京旅遊，心血來潮突發拜訪大學者之念，臨時唐突叩門，竟蒙迎入；會晤時請教，我小叩，錢先生小鳴，甚至大鳴。

讀錢鍾書、夏志清、余光中三位的著作，析論他們的著作，和他們三位書信來往，會晤他們，以至與三位中一位成為大學裏的同事，是我數十年裏極為重要的文學活動。錢、夏、余三位各有其傑出的成就：錢鍾書有「文化崑崙」之譽，夏志清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和《中國古典小說》二書獲經典之稱，余光中筆臻五采，為詩文宗師。三位都是博雅之士，就其最凸出之處簡而言之，則錢博學，夏卓識，余壯采。錢鍾書的博學，充分表現於他的《談藝錄》和《管錐編》二書。他談論人文學科的眾多議題，徵引中外大量典籍，發表意見，成其「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」的學說，與一千五百年前劉勰的「至道宗極，理歸乎一；妙法真境，本固無二」理論遙相呼應。夏志清研讀中西文學經典，聚焦於中國現代小說，有如《文心雕龍·知音》說的「圓照之象」，發現和評審卓越的作品（他所說的 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）。他超越「政治正確」的環境，高度評價錢鍾書和張愛玲的小說，加上其他種種卓見，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成一家之言，影響深遠。余光中手握彩筆七十年，金色筆寫散文，紫色筆寫詩，黑色筆寫評論，藍色筆翻譯，紅色筆編輯書刊；他「藻耀而高翔，固文筆之鳴鳳也」（《文心雕龍·風骨》語）。如果借用古代的「三達德」形容，則錢先生「文智」、余先生「文仁」（注）、夏先生「文勇」；採用西方文學史的術語，則他們都是中華近世文學史的 major writer 或 major critic；個別評價甚至可以更高。

數十年裏我閱讀他們的作品而獲益至大，與他們交往而啟發感悟甚多，這本《文化英雄拜會記：錢鍾書、夏志清、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》是我獲益因而說明益處、感悟因而記錄經驗的文章結集，可說是一個學生上課聽講和課餘向導師請益的筆記——鄭重其事記下來且經過潤飾的。李白詩句「交乃意氣合，道因風雅存」，說的是他與一位文友的交往，交往的大概是個平輩。我已屆「從心所欲」之齡，但年歲與心情，一直是錢（1910–1998）、夏（1921–2013）、余（1928年出生）三位的晚輩。錢鍾書和夏志清兩位如果仍然在人間，則錢、夏、余加上我，年齡成有趣的遞減：一百後、九十後、八十後和七十後。我是後學，不敢言論交，但「意氣合」是確然的事；見賢思齊，因為他們的「風雅」，我的文學事業得以長進。

他們三位幾乎合而為一，成為the Holy Trinity（神聖的三位一體）——應該改稱the Sage Trinity（賢能的三位一體），因為他們不是神。在本書的多篇文章中，如標題之作〈文化英雄拜會記〉，以及〈記余光中的一天〉，他們三位都出現。事實上，他們惺惺相惜：夏先生盛讚錢先生的小說和文學評論；余先生指導過研究生寫成錢氏作品評論的學位論文，且在2009年台灣的錢鍾書百年誕辰研討會上，發表論文析評其《圍城》。《圍城》是夏、余悅讀高評之書；錢先生則敬重夏先生這位知音，讀過余先生的作品。三位文學大家這樣的組合，更可說是兩岸三地文學的中華一體。錢鍾

書原籍江蘇無錫；夏志清出生於上海浦東；余光中原籍福建永春，歸屬台灣作家，曾在香港任教十年；如果連我這個「撮合」者的香港身份也計算，則兩岸三地的中華一體特色更為明顯。

本書收錄的文章共有23篇，分為錢、夏、余三部分。每部分開頭的若干篇，如第一部分的〈大同文化·樂活文章〉、第二部分的〈博觀的批評家〉、第三部分的〈璀璨的五采筆〉等，一般謂之論文；其他如〈楊絳就是鍾書〉、〈春風秋月冬雪夏志清〉、〈記余光中的一天〉等，謂之散文。本書於是可謂論文與散文的合集。其實對我而言，本書的文章類別可分而不可分。在「論文」中，我力求文字活潑，有姿采有個性，像美文一樣；在「散文」中，我力求內容有學問有見識，有論文的思維。換言之，於前者，我「以文為論」；於後者，我「以論為文」。「以文為論」是余光中先生的個人主張和風格，我演繹其意，即論文應該「言資悅懌」（《文心雕龍·論說》語），也就是古羅馬賀拉斯(Horace)的「有益又有趣」之意。綜合而言，不論是論文或是散文，都應該做到錢鍾書先生要求的「行文之美，立言之妙」，也就是劉勰主張的情采兼備；三位先生最為凸出的品質——博學、卓識、壯采——都要擁而有之。這是我大半輩子為文「雖不能至」的嚮往，就像對三位大師學術和創作境界的嚮往一樣。

本書得到母校出版社青睞，社裏黃麗芬、葉敏磊、楊彥妮諸

位在行政和編輯等多方面的支持與襄助，我非常感謝。還要多謝母校前任校長金耀基教授，他題寫書名，為本書增添金光；耀基先生是著名的學者、散文家和書法家，一向為我所敬佩。母校多有錢先生的知音，更曾決定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學位；近年在劉紹銘教授的協助下，母校出版社推出了夏先生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等多種著作；余先生在母校教學十年，桃李滿香港，創作大豐收。三位先生與母校有這樣的淵源，或許還可以加上我是中大的校友也是曾經的教授這個元素，這本記述三位先生的文集由母校出版社出版，如此背景，還有更深厚更強勢的？

此外，我要感謝數十年來發表本書篇章的兩岸三地諸位編輯先生女士，以及台灣的九歌出版社；九歌2004年出版了拙著《文化英雄拜會記：錢鍾書、夏志清、余光中的作品與生活》一書，後來我取回本書的版權，極大幅度增刪此書的篇章，成為目前這本同名的文集。新增加的很多篇文章，都是九歌版以外的近年書寫，包括近至今年7月所撰的〈到高雄探望余光中先生〉。本書所附的多張珍貴圖片，也包括新近的照片。最近（10月25–28日）我在高雄參加中山大學舉行的「余光中書寫香港紀錄片發表會暨慶生茶會」。余先生1985年9月離開香港到高雄任教，是年11月他寫道：香港十年是他「一生裏面最安定最自在的時期……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學生命裏佔的比重也極大」；他本人對這部紀

錄片十分重視。本書的〈記余光中的一天〉正是這位詩文宗師香港時期作品和生活的一個抽樣紀錄。

【注】余光中〈破畫欲出的淋漓元氣——梵谷逝世百周年祭〉說梵谷是「藝術的傳道者，最後更慷慨成仁，做了藝術的殉道者」；余先生一生從事文學，是文學的傳道者，鞠躬盡瘁，我認為是個慷慨的仁者。順便指出，歷來我評論余先生作品的文章，在三位中是最多的，有專著《壯麗：余光中論》（香港：文思出版社，2014）等。

—— 2017年11月2日（重陽節後五日）寫畢

【補記】本書《文化英雄拜會記》記述錢鍾書、夏志清、余光中三位的作品與生活。前兩位先後在1998年和2013年辭世，余光中先生也於2017年12月14日仙逝了。余先生詩集《五行無阻》的標題之作（寫於1991年）的最後一節是：

風裏有一首歌頌我的新生 / 頌金德之堅貞 / 頌木德之紛繁  
/ 頌水德之溫婉 / 頌火德之剛烈 / 頌土德之渾然 / 唱新生的  
頌歌，風聲正洪 / 你不能阻我，死亡啊，你豈能阻我 / 回  
到光中，回到壯麗的光中

我相信詩翁會活在「壯麗的光中」。

至此三位詩宗文豪都不在人間；他們同在寒冬的12月升到天上的白玉樓，自此在和暖中可一起談文說藝了。

—— 2017年12月15日